



教育研究發展現況的省思

甄曉蘭*

一、前言

隨著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轉移，相關研究理論、觀點與方法不斷地推陳出新，教育研究的方法設計與詮釋觀點亦變得更加多元與豐富，不再侷限於「邏輯實證」(logic-positivist)的操作技術與思維邏輯，而所關注的議題焦點更是大為擴張，舉凡有關價值、信念、興趣、經驗、知識、權力、文化、政治、美學等，以前被視為無法建立操作型定義、無法測量的議題，現在都成為可以接受、甚而大為流行的研究焦點，反映出當代教育研究領域在「後現代」脈絡之下，形成了一股拒絕專斷、包容差異的多元表述特質。然而，在當前的教育研究自由氛圍與多元發展趨勢中，研究者對各種研究有關於「方法論問題」和「選擇的責任」的探討與釐清，就變得相當的重要，否則，各種多元的自由選擇，很容易導致方法概念混淆不清與應用不當的窘境，甚而造成學理分析上眾說雜陳及結果討論所憑無據的困局。

近十餘年來，教育改革政策議題不斷，國內的教育研究可說是蓬勃發展，在新興研究議題的跟進上，似乎呈現出一種交相競逐、不遑多讓的態勢，但是相關研究的成果，在理論建構、知識生產與累積方面的貢獻，或對教育政策、教學實務改進層面的影響，卻都不盡理想。面對所浮現的研究品質問題與對研究價值的質疑，我們似乎必須在研究議題上有更睿智的「選擇」，在研究理論上有更敏銳的「自覺」，並且在方法應用上有更深刻的「反省」(甄曉蘭，2007)。當然，若要使教育研究更具意義、更有貢獻，必得要對當前教育研究的發展方向及相關的方法問題進行批判檢討，或能從中重新梳理出重要的研究方向與議題，更加審慎地運用適切的研究方法，前瞻性地開發出具有實務改進效益、學術創新價值的教育研究。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二、教育研究發展現況與方法問題的檢討

當代教育研究的發展，因著典範之爭背後的歧異觀點，牽引出不同於邏輯實證論的研究思維，產生了不少方法論的遞變與技術的更新。若從探究形式與方法的運用來看，不難發現教育研究的方法取徑確實相當多元，早期進步主義時代或以哲學分析為主，而後大多以內容分析、實驗研究、調查法或比較研究居多，但近二、三十年來隨著質性研究典範的遞變，有越來越多教育研究採用質性的研究取徑，例如：關切教室生活經驗的「觀察研究」；著重實務改善的「行動研究」；強調教師教學經驗故事的「敘述探究」和「個案研究」；將生活經驗展現於「本文」的「現象學」和「詮釋學」的方法；意圖進行文化理解，解放受壓迫者的「批判俗民誌」；採用與評論家和鑑賞家批判的方法進行的「教育鑑賞」；以及以傳記和自傳解釋教育經驗的「生命史」等等（甄曉蘭，同上）。

此些或源於不滿於「量化方法」的濫用、誤用與理論侷限，轉而積極倡導、應用新的研究典範，以期超越傳統「經驗—分析」的限制；或為融合不同領域的方法特色（如人類學、社會學等），聚焦於「闡釋性」、「質性」研究紮根理論的發展；甚或企圖超越闡釋範疇，關切族群、性別、文化、認同、教師主體、弱勢者教育等批判性社會改革議題。然在質性研究取徑多元發展風潮下，不少教育研究卻出現了「追求流行」、不求甚解的盲從現象，雖是殷切突破、努力發揮，但在時髦學術語詞與方法宣稱的背後，常呈現出許多模糊的概念與錯雜的語用，更因著未能掌握各種不同研究途徑的精神與特色，導致產生了另一層面「質性方法」的濫用與誤用情形及理論建構的困境。諷刺的是，無論是質、量的二元「對立」，兩者間的來回「擺盪」，甚或是幾經「和解」下混合方法（mix-method）的推出，似乎都存在著「過猶不及」的缺失，往往過度強調方法論述的推陳出新，卻忽略了講究方法思維的精緻周延與研究目的本身的實質意義。

曾有機會回顧分析國科會教育學門之課程研究及師資培育研究計畫（參見甄曉蘭，2005&2010），發現不少研究計畫無論在研究方法取徑的適切性、研究設計的縝密性、分析的嚴謹度、效度的建立過程及研究成果的呈現等，都還存在著不少有待改進的缺失。包括：普遍存在「質量並重」的迷思，在未審慎評估「必要性」與「勝任度」的情況下，便大膽宣稱採用「質量並重」設



計，卻落得量化工具發展不夠嚴謹，質性探索設計亦不夠深入；方法概念混淆不清，將「文獻探討」與「文件分析」、或將「內容分析」與「文件分析」混為一談；研究設計不夠嚴謹，未能掌握不同研究取徑的精神與特色，不但方法的宣稱與研究目的無法契合，實際的方法設計亦不符相關方法取徑的精神與原則；資料分析僅做到初步資料的分類整理，以致研究結果與討論呈現大量資料堆砌，並未針對資料的意義網絡進行分析與詮釋，遑論根據研究「發現」進一步提出批判性討論或獨到見解；另外，許多研究成果報告只有實證資料的陳述與說明，少有理解詮釋與批判討論，更有不少報告是以個人經驗故事或研究操作過程的發展為主軸，並未突顯研究的議題及更大的教育關懷，自然也就未能提出新的概念主張或新的理論架構。當然，這些問題並不只是在國科會教育學門研究計畫報告中出現，而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此，除了要加強研究者相關研究方法論的認知理解與實務演練外，更要確實瞭解影響教育研究品質的關鍵問題——投入度與組織的問題（problems of commitment and organization, Walker, 1992），或許才能對症下藥，具體改進之。

晚近，由於高教學術評鑑制度的推動，SSCI、A&HCI 或者現行 TSSCI 的論文發表數量統計，成為學術表現的評鑑 / 獎勵的依據，使得追求「速效」、「量產」的研究策略與技術蔚為風氣，許多教育研究轉向為致力特定目的、商業性或策略性的應用研究，形成一種趨利傾向的「學術資本主義」（陳伯璋，2005）。在如此「反教育」的學術競逐情勢下，許多短線操作的研究「撇步」與寫作發表技巧，也就應運而生並且交相傳授，以有效衝高論文發表數量。在表面統計數字上，彷彿是提升了學術表現績效，但就學術的底蘊而言，實則並未真正改進研究品質問題，反而造成了學界生產過剩問題，大多數論文不過是浮光掠影、曇花一現，對整體學術知識的傳承與教育實務的改進，其實並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

畢竟，研究者若不斷追逐流行的方法與轉換新的研究議題，將很難有系統地累積研究經驗與成果、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而支持大型、長期、深度教育研究的機制與補助又未得建立，當然也就很難讓研究者得以專注地投入特定教育議題的長期追蹤探索，從而產生更有品質、更具價值的研究成果。如前所述，難以產生好的教育研究的最大障礙，在於投入度與組織的問題，為改進教育研究的品質與增益研究的學術與實務價值，研究者須對重要的研

究議題有所堅持，願意長期投入教育理論於實務應用的探究；當然，更要建立支持教育研究的組織運作系統（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好讓整個教育研究社群無論在研究方法的交流或研究成果的分享方面，都能夠更精進效益、更臻健全。

三、教育研究與政策及實務關係的反思

研究與政策及實務的關係，是各國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雖然許多政府相關教育研究都宣稱要推動證據知會的教育政策（evidence-informed policy），以強化開發、推廣「有效」的方案，而許多決策單位似乎也致力於促進與教育研究者的對話，但研究社群卻不免要面對其研究「品質」和「適切性」的檢核。教育研究的相關缺失，包括：不夠嚴謹（品質不佳）、未能產出累積性研究發現、理論上的不一致、意識型態上的偏見、不適合學校實務、缺乏教師參與、資訊管道不通且未普遍推廣、成本效益不彰等（Whitty, 2006）。當我們回顧國內外相關教育研究時，不難發現許多研究宣稱相關策略方案有效，卻大都只是口惠不實的文辭辯解，缺乏具體證據解釋其方案有效的原委。基本上，以研究為基礎的專業，其專業實踐應有具體研究成果的支持與引導，始能積極回應問題，而不是堆積假設（assumptions）而已。誠如潘慧玲等（2007）在教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規劃案成果報告中所指出，教育學是一門實用性格極強的學科，教育研究應以解決教育問題為導向，面對著層出不窮的教育改革及教育議題，教育研究者不應置身事外，埋首於自身的學術研究與發表而已，必須要重視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結合。的確，屬於應用科學的教育研究，如果不能產生「有用的」的知識、處理研究與政策／實務間的合理關係，必然影響大眾對教育研究的支持。教育研究者要認真地檢討對教育研究的相關批評，使教育研究有助於證據為基礎的政策與實務，所進行之相關研究也要釐清相關批評背後假設的適切性，才能有效地為教育研究、政策與實務進行有力的辯解。

當然，知會教育決策的「證據」（evidence）來源，不一定僅來自於教育研究，其他資訊、價值、信念、政治、經濟等層面的具體證據，都會影響到教育的政策與實務，但是對教育現象和問題所進行的系統性教育研究，絕對能夠提供理性參照證據，發揮其說明、理解、轉換、澄清、警告、指引、評鑑等功能，來促進教育決策品質的改進，並激發行動實踐力、提高教育表現與



績效責任（參見王麗雲，2006）。教育研究無論是採量化或質性設計、巨觀（macro）或微觀（micro）分析，只要是嚴謹的研究設計與分析，或多或少都可以提出具體的證據來知會相關決策，亦即，都可以呈現決策／方案的有效性、決策行動需求、成功實施的指引及相關成本效益等。然而，若要處理較高層次、較大層面的政策議題，則得藉助於系統性回顧（systematic reviews）相關研究，以超越單一研究的限制，發現相關研究間的一致性和差異性，累積較充足的教育研究知識，作為教育政策與實務之參考，惟系統性回顧（最常運用者為後設分析）的品質，取決於所依據的原始研究的品質，以及後設研究分析者所持相關研究篩選標準的嚴謹度、透明度與報告分析程度（Chalmers, 2005; Davies, 2000）。面對目前國內量多龐雜的教育研究成果，卻相當缺乏系統而宏觀的後設分析研究，也難怪對教育政策與實務問題鮮有具體的實質助益，因此有必要針對重要教育議題，篩選出品質不錯的原始研究進行系統性回顧，或能理出具說服力的研究證據，作為相關政策與方案評估之判斷依據。

另外，就促進研究影響政策和實務層面而言，教育研究者與不同利害關係人建立伙伴關係，並善用各種機會推廣宣傳研究發現，是非常關鍵的策略。雖然教育研究工作者，各自有其研究興趣與教育理想，甚至所謂的學者風骨，但如果要使研究對政策有所影響，教育研究者必須要對相關教育政策與實務的批評有所回應，並積極與決策單位保持距離的「打交道」，瞭解政府教育決策部門的既定考量與議案規劃（agenda），從而進行有品質的研究探索（而非為政策背書），在相關議題上建立積極的對話討論平台，以加強大眾對教育問題的理解，形成所謂的專業判斷，得以抗拒具表面吸引力的錯誤政策；甚或可以應用 Whitty（2006）所謂的「政策風潮」（policy epidemic）為工具，來進行跨國政策分享，以避免重蹈他國失敗之覆轍。當然，教育研究要能達到直接影響政策之效，並不容易，需要許多情境條件的相互連結與配合，因教育本身即是一種道德與政治的實踐（education as a mor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教育研究在講究其技術層面的精進之外，更要顧及其在研究脈絡中的文化角色（cultural role）與所涉入的政治處境，唯有透過持續不斷的民主辯證與審議，才能拓展教育研究與政策及實務的相互影響關係（Biesta, 2007）。畢竟，一個嚴謹、有證據支持的研究發現，較具高說服力，能幫助大眾和決策者，破除舊有迷思、拋棄舊有假設，願意重新思考相關議題，針

對問題重新探詢更適切的政策調整方向與實務改進方案。而基於營造生氣蓬勃的教育研究文化是帶動政策發展的重要基石，Whitty (2006) 所提以下建議，或可作為國內教育研究社群發展之參考：

- 鼓勵積極主動的教育研究社群
- 促進教育決策者、實務工作者、甚而國家與國際教育相關學會之合作與討論
- 鼓勵、支持對教育研究品質、目的、內容及方法論的辯證
- 發展、護衛獨立研究文化以投入開放的探究與教育改進
- 透過溝通、訓練、表徵系統加強對學術社群教育研究人員的專業服務

四、對臺灣教育研究的期許（代結語）

有鑑於臺灣教育研究焦點相當零散，而本土教育理論建構更是不足，或許我們實在需要更多的自省，努力改變我們的研究心態與思維格局，以嚴肅的態度來正視有關研究品質的問題，以及研究與政策及實務脫節的現象，審慎思考臺灣教育研究應該走的方向。因為「流行不一定前瞻，熱門不一定重要」，教育研究不能只是追隨流行的方法、擁抱熱門的議題，而是要慎思處在當前的思潮轉換與社會變遷的教育情勢下，什麼是應該研究的？什麼是值得研究的？什麼研究是具有長遠發展價值的、是能夠指導政策的、是能夠帶出實務影響的？有意義、有價值的教育研究，絕對不是忙著引介學理新知，說些時髦的學術語言，也不只是隨著政策起舞，空談改革理想而已，而是要敏銳地掌握教育領域的重要議題與教育研究的發展趨勢，奠基於豐厚的學理基礎，透過嚴謹周詳的研究設計與執行，呈現出對人（研究參與者）的關懷及對教育問題的思維與理解。期望日後有更多「大器」的教育研究，經由學術社群的群策群力、長期的深耕、紮實的累積，來帶動教育學術的創新，影響教育政策並促進教育實務的改善。

參考文獻

- 王麗雲 (2006)：《教育研究應用－教育研究、政策與實務的銜接》。台北：心理。
- 甄曉蘭 (2010)：〈師資培育研究與政策發展－失落了什麼？〉專題演講於九十九年度「國科會教育學門教育行政與政策、師資培育領域專題計畫成果發表會」。2010年10月30日，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 甄曉蘭 (2007)：〈課程研究的趨勢與方法論議題〉。《課程與教學季刊》。10 (3)，49-62。



- 甄曉蘭 (2005)：〈課程研究方法論〉。專題演講於「94 學年度教育學門課程與教學領域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台南：國立台南大學。
- 陳伯璋 (2005)：〈學術資本主義下臺灣教育學門學術評鑑制度的省思〉。載於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pp. 205-234)。台北：臺灣社會學研究季刊。
- 潘慧玲、陸偉明、黃慕萱、謝仲裕、方永泉 (2007)：〈教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規劃案成果報告〉。未出版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 Biesta, G. (2007). Why “what works” won’t work: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the democratic deficit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Educational Theory*, 57 (1), 1-22.
- Chalmers, I. (2005). If evidence-informed policy works in practice, does it matter if it doesn’t work in theory. *Evidence & Theory*, 1 (2), 227-42.
- Davies, P. (2000). The relevance of systematic review to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ractice.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6 (3 & 4), 365-378.
- Walker, D. F. (1992).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urriculum research. In P. W. Jackson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urriculum*. (pp. 98-118). New York: Macmillan.
- Whitty, G. (2006). Education (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olicy making: is conflict inevitable?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2 (2), 159-176.